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中国共产党在滇西抗战中的社会动员

曾黎梅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动员工作成效显著。毛泽东同志曾总结道:“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和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1938年1月11日创刊的《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控制区唯一公开发行的党报,以“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为主要任务。该报拥有广泛读者,在1939年至1945年间刊登滇缅战区相关报道870多篇,为西南地区的思想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揭露和预判日本政府侵略意图

作为抗战时期创办的报纸,《新华日报》不仅客观、及时地报道战争的进展情况,同时非常重视从全局性分析、预判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变化。1938年12月,周恩来对负责战地新闻和国际新闻的记者说:“敌人现已转移兵力扫荡其后方,而在正面战场上暂停进攻,以配合政治上诱降策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针对性的政略和战略,才能击破敌人的阴谋诡计”,同时“要密切注意全局性的形势发展”。

1940年7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确定“南进政策”,包括武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和获取荷属印度尼西亚资源等,此举给中国政府带来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揭示日本“南进政策”及其真实意图显得尤为迫切。早在1940年2月12日,《新华日报》就发表社论,通过分析日本首相米内光政的言论,指出日本正加紧推行“南进政策”。同年6月21日,该报再次刊文认为,鉴于欧战扩大及日本此前对苏受挫,其南进倾向日益明显,而法属安南(越南)很可能成为其主要目标。文章警告,日本若进犯安南,必将借此加强对华进攻,增加中国抗战困难,同时削弱对英美的依赖,严重冲击英国的战略利益。6月22日,《新华日报》进一步揭露日本企图控制安南的两个目的:一是切断

中国的国际交通线,二是以安南为基地策动叛乱,分化中国西南大后方的团结。

1940年10月,《新华日报》分析指出,日军占领越南后可能进一步破坏滇缅公路运输,甚至发动新的军事行动,呼吁国内加强云南防务和抗战准备,并建议各战场适时配合出击,同时增强陪都重庆的防空能力。该报强调滇缅公路的战略重要性,并提醒若缅甸失守,将在政治和战略上对全国战局造成严重冲击,不仅影响物资供应和民心稳定,还将导致西南防线面临崩溃。

此后,日军于1942年进攻并占领缅甸,中国政府派出远征军入缅作战。《新华日报》刊登多篇重要文章,如《日寇加紧南进中我们应有的警惕》《论缅甸战事》《反攻缅甸,当务之急!》等,这些文章既为决策提供参考,也在全面抗战中发挥了舆论引导作用。

与日本舆论宣传展开博弈交锋

日本侵略者在发动军事战争的同时,也积极展开舆论攻势,以对中国展开思想侵略。对此,《新华日报》积极关注日本政府在舆论宣传方面的动向,并对日本的侵略言论予以反击。

为顺利推行“南进政策”,日本试图利用舆论削弱南亚、东南亚地区民众的军事抵抗意志,破坏中国西南的外部屏障。针对日本以支持“独立运动”为名、实则企图独霸远东的阴谋,《新华日报》进行了揭露和分析。报道指出,日本为巩固在华侵略成果,收买部分报纸散布谬论,煽动某些政党要求缅甸政府对华增税,并布置谍奸破坏滇缅交通,挑拨中缅商贸关系,企图阻碍中缅运输与贸易。《新华日报》呼吁“缅甸当局和人民警觉此奸计,勿予可趁之机”,并揭露日本所谓“无领土野心”实为欺骗当地人民与英、法、美、荷等国的障眼法。在反击日本阴谋时,该报强调“中华民族和南洋一带弱小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是唇齿相关,血肉相连的”共同体关系。

1943年2月,《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及时揭露日

本企图进行民族分化的阴谋,文章分析日本和泰国的“大泰族主义”的宣传,企图把南掸部、滇省西南部的傣族列入泰族系统,文章提醒社会各界,“敌人也曾有分路向橄榄坝进攻的企图,敌人在军事上的企图与政治阴谋齐头并进,这里,应当使我们深自警惕的。”

由于历史因素和日本的宣传动员,在缅甸抗战过程中,《新华日报》刊文指出,必须充分认识到依靠缅甸民众的重要性。有些人仅关注军队力量,却忽视了其他因素,而日本早已在缅甸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例如,一些敌军军官曾以和尚身份潜伏于缅甸寺院,导致部分缅甸青年僧人协会的领袖在战时与敌军勾结,破坏守军行动。无论这种协助是消极还是积极,缅甸守军都因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坚定民众团结一致抗战的信心与决心

周恩来同志在承担《新华日报》出版工作时提出,编辑方针应做到“稳——不失立场,活——不呆板,要巧妙”,“要使材料丰富、新鲜、迅速、客观”。在政治宣传上,他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坚持团结第一,要求进步与团结并重;二是把握时机反悲观,拿办法,不论在军事或政治方面,都要用解放区的例子来证明“我们是有办法的,能够坚持抗战”。《新华日报》作为党在“大后方”坚持抗战、团结与进步的重要旗帜,积极充当人民的喉舌,既敢于说出真理,也善于说出真理。周恩来认为,该报所发挥的作用堪比党的一个方面军。在他的领导下,报纸坚决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真正成为传达人民声音的号角。

《新华日报》在社会动员中坚持使用通俗化、大众化的语言,以确保普通文化水平的读者能够理解,从而实现更广泛的动员效果。该报在报道滇西抗战时,所转发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新闻与日撰社论及新闻在语言风格上存在明

显差异,后者更为通俗易懂,便于读者迅速把握时局动态及其意义。此外,该报还高度重视宣传普通军民在抗战中的贡献,相关报道频繁见报。在滇西抗战报道中,该报以较多篇幅介绍中国军队、云南民众、华人华侨、南侨机工及滇缅公路上的工人等群体的英勇事迹,弘扬他们为抗战所作出的牺牲和斗争精神,以此鼓舞各族民众积极投身抗日阵营。

《新华日报》以“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为办报方针,受到读者广泛欢迎。抗战期间,该报发行量从初期的一万 multiple 份增长至后期的五万多份。据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回忆,他在西南联大就读期间曾订阅该报,当时校内也有其他同学订阅。他表示,由于对官方宣传持保留态度,许多师生更愿意接触《新华日报》所提供的不同声音。另有一位从中缅边境龙陵逃至昆明的中学生提到,他在昆明期间不仅订阅了《新华日报》,还积极参与进步演讲和学生运动,反映出该报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

在抗日战争中,社会动员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华日报》在滇西抗战期间积极开展社会动员工作,不仅持续客观地报道战事进程,还及时揭露日本的侵略意图,与日方舆论展开斗争,深入分析抗战形势,增强民众团结抗战的信心。通过这些努力,《新华日报》为坚定民众抗战意志、推动抗战进程以及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代内地民众对边疆认知演变研究”(项目编号:22BZS101)的阶段性成果]



游客在滇西抗战纪念馆参观。
本报记者 陈飞摄



滇西抗战纪念馆 本报记者 陈飞摄

书评

共建“一带一路”的商业文明——品读《滇商》感悟滇商的时代转译

范之能

前段时间,因对云南商业史的好奇,笔者翻开云南财经大学教授赵旭先生编著的《滇商》,本以为是寻常阅读,却意外踏入一段满是传奇与感动的旅程。《滇商》一书让我知晓,在云南历史长河中,从秦汉时马帮踏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开启贸易,到近现代滇商于复杂局势下艰难转型、持续奋进,这一群体恰似璀璨星辰,闪耀独特光芒。书中所载的蒋宗汉,便是这群星丛中极耀眼的一颗,其故事既是滇商的生动写照,亦是家国情怀的鲜活注脚。

出身鹤庆贫寒农家的蒋宗汉,年少时便在茶马古道的马帮铃声中深深生存法则。清末战乱之际,他毅然从戎,并屡立战功,凭“刀光映照边关”的勇武,从普通士卒晋升为一品提督。这份于危局中逆势而上的坚韧,正是滇商“百折不挠”精神的生动注脚——恰似马帮穿越怒江峡谷,在滇西、四川、山东等地设30多处购销机构,更于香港、上海开展国际汇兑业务,40多个商号、工厂形成“滇商为基,辐射东南亚”的商业网络。这种“南下越老达泰柬,西接缅甸连孟印”的跨国贸易体系,与共建“一带一路”西南通道战略形成奇妙呼应——百年前马帮驼队虽

无现代物流,却已凭开放胸襟构建起早期跨国供应链。

更具时代特色的是蒋宗汉“利不独吞”的经营哲学。当日商凭技术与资本低价倾销垄断东南亚丝绸市场时,他以“国货当自强”的信念,改良工艺、严控质量,推出“狮球牌”细丝与“桃牌面粉”,让“云南制造”站稳国际市场。在蒋宗汉的商业版图中,山东博山“解丝”工厂堪称时代缩影。晚清工业薄弱,外资挤压,他将生产基地延伸至千里之外,结合博山原料优势与云南技术,使“解丝”经上海远销伊朗等国。这一创举既是跨国产业链的早期探索,更彰显“利不独吞”的内涵。这种商业智慧,恰似茶马古道马帮“以商载道”的传承,在商业中肩负文化传播与民族复兴的双重使命。

蒋宗汉的商业实践中,藏着滇商特质的三重密码:军政商三界游刃有余,诠释“以和为贵”的生存智慧;跨国贸易坚守“秤平斗满”,固化“诚信本分”的商业伦理;热心桑梓,将商号利润投入家乡水利、桥梁建设,彰显“达则兼济”的社会责任。这些精神特质,恰似茶马古道的青石板经岁月打磨愈发光亮,成为当代企业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精神标杆。

回首历史,滇商辉煌令人赞叹;展望当下,滇商内涵依旧熠熠生辉。如今滇商在数字化贸易时代持续传承,更显蒋宗汉这位红顶商人的传奇意义——它不仅是个人奋斗史,更是中华民族开放包容走向世界的精神寓言,其蕴含的“以和为贵、守信重诺、务实创新”的商业伦理与“利不独吞”的经营理念,恰似穿越时空的指南针,为当代企业家指明破局之道。

《滇商》这部著作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滇商在中国商业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价值,相信在其激励下,未来会有更多企业家创辉煌业绩,续写中国商业发展新篇章。

(作者单位:云南省人大财经委)

做父母为何变得这么难

——评《同舟异路——城市家庭儿童养育的多元实践》

马佳

《同舟异路——城市家庭儿童养育的多元实践》(段岩娜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6月第1版)是一本关注儿童“养育”问题的社会学新书。作者段岩娜长期从事家庭与教育领域研究,关注到当下因养育孩子而产生的“鸡娃”“母职倦怠”“养育焦虑”“不快乐的童年”等社会现象。从思考当前“为人父母为何总是或多或少感受到‘养育之艰’”为导引,身为两个孩子母亲的作者将自身的养育体验与研究者的理论自觉相结合,通过观察40多个典型家庭的养育行为及其观念,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进行行为与讨论,当前城市家庭的不同儿童养育实践。据此分析当下社会转型引发的家庭养育模式转变的深层社会原因与机制,以期让更多的人多些理解与反思。

城市家庭儿童养育的多元实践。家庭养育方式的多元化是本书的主题与重点。为了分析之便,作者依据父母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与主观阶层认同,将城市家庭分为中产家庭和工薪家庭两类。依据教育期望、教育参与和亲子关系,将中产家庭的养育模式概括为:密集型养育、反思型养育和反向型养育三类;将工薪家庭的养育模式概括为:依循型养育、摇摆型养育与无力型养育。这些类型的提炼来自民族志材料,分类是一种方法与研究路径,作者强调,这样的分类并不绝对与全面,而主要是为了研究分析需要。无论是中产家庭还是工薪家庭,其养育模式均没有“好”与“坏”之分,都是其基于关心子女以及帮助子女未来实现美好生活这一目标之下所选择的不同教养策略。通过六种养育模式的呈现与分析,读者能体会到养育实践的多元化,并理解这些不同背景下的复杂因素。

多元养育实践如何形成。个案研究是本书的出彩之处。读者在阅读中,可以就所呈现的事实、娓娓道来的口述、细腻的情感表达,体会到养育实践中父母种

种策略选择的动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不安与无奈,以及对子女的种种担忧。基于个案本身的呈现与分析后,作者尝试打破养育模式的类型化,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场域、资本与习性)来分析城市家庭育儿模式多元化背后的逻辑与机制。养育模式由传统到当代的变化,或是不同阶层内部,或同一阶层内部的差异性均是身处养育场域中的父母基于“习性”而实施的不同“策略”。作者认为,“个体的养育实践是一种社会建构的实践行为,受到父母自身的成长经历、社会流动经历、父母当前的职场处境、家校互动、同伴群体、教育政策及父母的反思性等一系列因素的复合影响。”最后,作者研究得出:养育实践并非必然的社会现实和规则的复制,而是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和“主体性”的反思性行动。

破解“养育之艰”的出路何在。阅读本书,我们能透过一个个鲜活与直击心灵的家庭养育实践看到个体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形塑。如作者期盼的,本书的一个价值,在于“通过鲜活的个体、自身的养育困境,让人多一些同理心来体察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在养育实践中的差异”。书的最后,作者从教育政策革新、家庭养育理念重塑、推动家庭领域父母共育等六个方面提出了建议,分别是:从传统优秀育儿文化中汲取养育智慧,构建尊重父母养育本能和本土文化的养育实践;构建多元的教育评价体系,鼓励多元化育儿;重塑教育观念,倡导“园丁式”父母;重构父职,鼓励父母共同参与儿童养育,缓解母职倦怠;重视家庭养育方式与儿童心理健康的关联以及社会政策对弱势家庭儿童养育的支持。这部以自身生命体验浇灌的学术之作,最终指向社会学研究的终极关怀——对社会结构中人之主体性的关照与尊重。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

穿越千年的滇商——

从马帮传奇到数字商路的精神密码

陈力 赵崔莉

在祖国西南的云岭高原,横断山脉的褶皱里藏着一部流动的商业史诗。这里,雪山与江河共舞,多民族文化交织共生,特殊的地理和文化,孕育出中国商业史上独具风骨的滇商群体。从历史驼铃中走来,向时代浪潮中奔去。2021年7月,云南首届滇商大会在昆明顺利圆满召开,以“开放包容、富滇济世”为核心价值观的滇商内涵不断传承、弘扬。这一精神深深植根于云南千百年独特的历史文化沃土,无数滇商在漫长岁月里以担当践行使命,历经世代拼搏与无私奉献,这份精神特质不断凝聚、淬炼、升华,成为流淌在滇商血脉中的文化基因。

开放包容 滇商穿越山海的精神底色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高山深谷纵横交错,江河奔腾其间。在古代,交通状况极为闭塞。商队若要将云南的茶叶、铜矿、药材等特产运往中原或边疆地区,途中不仅要面临野兽袭击的威胁,还要经受极端天气的考验。这般艰难险阻并未束缚住滇商的脚步,反而锤炼出他们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的坚韧精神。

云南是多民族聚居地,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这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纳西族的东巴文化等,共同交织成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场域。与此同时,云南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与中南半岛和南亚国家的文化也有长久的交流和交融。这种“边疆性”与“开放性”的双重属性,让滇商天然具备开放包容的特质。他们既能与中原商人恪守相同的商业伦理,又能尊重少数民族的交易习惯,在跨文化贸易中灵活应变。自元明清以来,云南受中原文化影响更加深远,儒家思想与本土文化碰撞融合,形成独特的“边疆儒商”传统。滇商在经营过程中,不局限于本土的商业思维,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商业智慧。这种文化上的包容性,使滇商能够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开展商业活动,促进了历史上云南商业的繁荣。

新时代,开放包容的滇商在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驱动下,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云南,如今正持续推进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建设,而滇商则凭借其深厚的开放包容传统,积极投身于国际经济合作的大潮中,书写着辉煌篇章。他们不仅与国内各地区保持着紧密的商贸联系,更将视野拓展至周边国家乃至全球市场,跨境电商、国际物流、文化旅游等领域都留下了他们活跃的身影和坚实的足迹。

滇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用合作的力量共筑未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企业的远见与担当。随着云南对外开放不断扩大,滇商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接纳新技术、新观念,将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融入商业实践,不断拓展商业渠道,提升经营效率。在2025全球滇商发展峰会暨滇商总会成立两周年庆典上,“时代滇商·2025最具商业创新模式”优秀案例征集活动聚焦互联网驱动的商业模式革新、技术赋能的产业升级、服务创新的商业模式以及社会价值导向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四大创新领域,最终30家企业脱颖而出。这些优秀案例不仅展示了滇商在创新道路上的积极探索,更彰显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变革、以创新驱动发展的坚定信念。

富滇济世 滇商扎根家国的使命担当

云南商业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至秦汉时期的“五尺道”,但真正

走向繁荣是唐宋的“茶马互市”与明清的“滇铜京运”时期。在官方主导的贸易体系中,云南商人作为中间环节,承担的贸易活动不仅涉及巨额财富,更关乎国家的边疆稳定。例如,清代“滇铜京运”每年需运输数百万斤铜料。滇商通过“官督商办”模式,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确保了铜矿的稳定供应。他们坚守重信守义、以诚待人的商业伦理,例如,马帮首领(“马锅头”)将信誉视为生命,即便面临巨大的利益诱惑,也绝不私吞货物。这种“一诺千金”的品格,成为马帮精神的重要标识。再如,清代“同庆丰”商号创始人王炽,一生以利聚财,以义用财,积极推动云南的实业与教育发展。他先后开发了东川铜矿、个旧锡矿,在昆明设立了公益性的“兴文堂”,资助贫困学子。他还在灾年开仓放粮、修桥铺路,将商业成功转化为社会福祉,成为滇商“义利并举”的典范。像王炽这样的滇商并非个例,许多滇商在致富后积极投资地方教育,创办新式学堂,不仅承担社会责任,也推动地方发展。这种将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紧密结合的滇商特质,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与长远的发展眼光,也使得“边疆儒商”的传统在云南大地上得以传承与彰显。

近代以来,云南的边疆地位因国家危亡而愈发凸显。抗战时期,云南成为大后方战略要地,滇商在物资运输、工业建设、教育支持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滇缅公路上,数万云南商人与民工用血肉之躯抢修出“抗战生命线”,为抗战物资的运输提供有力保障。这种家国同构、勇于担当的精神,使滇商将商业行为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成为近代中国商帮中极具家国情怀的群体。他们以商业实力支持国家抗战,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做出重要贡献,充分体现“富滇济世”的高尚情怀。

《百年滇商》系列丛书总序中写道,云南商人最是心系家乡的公益事业,最是关心国家的命运。广大滇商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与家国同频共振、共同发展。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滇商积极响应号召,利用自身的商业资源和经验,投身家乡建设,带动云南特色产业发展。许多滇商企业通过建立农产品加工基地、发展乡村旅游等方式,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2021年,云南省“万企兴万村”行动启动大会发出倡议,号召滇商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广大滇商以实际行动践行承诺,为农村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2025年,滇商总会成立两周年庆典大会上,来自全球1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名滇商代表跨越山海,带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和在外积累的宝贵经验回到家乡,共叙乡情,共同探讨云南的发展机遇和合作方向。

总之,滇商在云南的历史发展历程中扮演着多重重要角色。他们是厚重的创业史诗的书写者,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在商业领域不断探索前行,从传统行业到新兴产业,都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商业成就。他们是闪亮的云南名片,以诚信经营、优质服务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和客户的信赖,将云南的商业文化和特色产品推向全国乃至世界。他们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从古代的马帮驼铃,到近代的滇缅公路,再到如今的中老铁路与数字商路,滇商的“商路”在变,但“开放包容、富滇济世”的精神始终赓续传承。

【作者1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社会科学教研部博士生,作者2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本文系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大思政课’铸育人的机制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4VVSZ115)的研究成果]

